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

栢 林^{1,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得以不断深化的。唯物史观是在近代产业革命基础上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接受的是唯物史观,它在近现代史上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明中国革命的方向,避免走许多弯路。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历史实践中受到了严格检验,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经过不断锤炼得以巩固和提高。唯物史观唯一的着眼点就在于如何将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配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因而能够引领时代,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发挥强有力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唯物史观;生产力;生产关系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9.017

党的二十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未来三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武装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1〕}现代化离不开物质财富创造力和科技力量以及激发社会有机体这种活力的制度因素,包括体制机制。其中,在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问题上,唯物史观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引领时代的发展。事实上,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个命题本身,就

是唯物史观率先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的。

一、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发现,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致悼词,对马克思一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思想贡献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最杰出的两大贡献分别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它们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唯物史观有着普遍意义,适用于所有历史时代、所有社会形态,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是资

作者简介:栢林,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学术创新工程“中华思想通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特点、性质和规律,相较而言唯物史观是更为根本的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则是特定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下具体化了唯物史观,是唯物史观对于特定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的具体运用,是特殊的唯物史观。

有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既然剩余价值学说只适用于过去资本主义时代,而历史又早已翻篇,那么,现时代社会主义与剩余价值也就没有了一切瓜葛,不再涉及剩余价值学说。事实果真如此吗?

显然不是。首先是我们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这是《共产党宣言》对于现时代的重大判断,是《共产党宣言》立论的根基。马克思主义根据大的历史时代观所确立的分析方法、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所下的判断和结论,都揭示了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个判断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当下指导性,是我们思考现时代所有社会问题的大背景。^[2]其次,当代全球化趋势,仍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资本逻辑的扩展。^[3]承认这样一种现实,等于间接地承认了剩余价值学说具有现时代的特殊意义。故此,对于诸如剩余、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特点和规律,仍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探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或一刀切地摒除在外。再次,别以为高挂免战牌,就能抽身世外,作壁上观。这种唯心论和不科学态度显然要不得,跟唯物史观决然对立。闭关锁国、孤芳自赏更是自欺欺人,只会自甘落后。^[4]最后,对内而言,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以及“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原则的确立,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剩余价值规律。^[5]就民营经济而言,它天然地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动力和条件,否则便不能存在,也存在不了。^[6]基于上述四点理由,剩余价值学说就是唯物史观的特殊表现形式。

唯物史观(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在内)澄清了长期以来纷繁复杂、众说纷纭、讳莫如深的社会

历史现象,揭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有生力量,使得人类历史发展从此得以从“自在状态”走向“自觉状态”。^[7]对普遍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和特殊阶段的唯物史观即剩余价值规律,都必须加大研究力度,促进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维护发展和稳定的局面。

唯物史观不仅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是人类社会成功走向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首先就要在唯物史观上下功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辨析、甄别各种片面乃至错误观点,避免陷入认识误区。

马克思主义170多年的发展史经历过无数次严峻的考验,有过很多深刻教训,因而得出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每当唯物史观这一指导思想贯彻到位、运用得当时,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能够蒸蒸日上;而当唯物史观被不加思考地生搬硬套时,再好的形势也会被白白葬送。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正反两面的例子都不胜枚举,反复磨砺我们对于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认知,逐渐变得炉火纯青、锐利锋芒。

历史跨入新时代,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国内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和各种横向的、纵向的间接经验,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也有了较以往更长时段的考察,认识得更加深刻。纵观20世纪最后10年和21世纪最初10年,世界格局已然发生重大改变,地缘政治由“两极”变单极,美国一家独大,北约东扩现象难以遏制,经济上全球化贸易体系(包括服务)、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兴盛,而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引发世界贸易和投资、经济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各方面新变化,成为百年来世界格局变化最大的影响因素,任重而道远,它为发展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前景。当然,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挑战会前所未有的,但是,面临的机遇也

同样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担负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任,有力地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二、唯物史观是在近代产业革命基础上产生的世界观方法论

特别要指出,历史上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位置的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心史观。这一点正好跟人们想当然的认识形成鲜明反差。唯心史观广为流布,浸润甚深,要驱散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唯心史观,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只要检视一下那些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唱本、说书、诗词歌赋,无不充斥着帝王将相史、王公贵族史,人中豪杰史这类意识形态。^[8]

唯物史观能够横空出世、后来居上,最终取代旧唯心史观,并不是无条件的。正是因为有了新的历史条件,才得到有力支撑并最终战胜对手,否则两种历史观的代谢更替便无从谈起,更难以发生。一如植物要有阳光、土壤、水分和空气,唯物史观这一新思想的萌芽也要有适宜的环境才能进发。然而,要使环境变得宜于新思想生长又谈何容易?倘若没有这个时代对于新理论的极大需求,很难想象唯物史观能一跃而起,撕开唯心史观广布的罗网。

当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也不乏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更是如此,但它不构成主流意识形态,更充当不了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王”。这里可以列出一长串人名,这些人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如古希腊泰勒斯(前624—前546)、赫拉克利特(前544—前483)、德谟克利特(前460—前370)以及希腊化时代的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再如我国,春秋时管仲(前723—前645)、战国时荀况(前313—前

238)、东汉王充(27—97)、南朝范缜(450—515)、唐朝刘禹锡(772—842)、北宋李觏(1009—1059)、张载(1020—1077)、明朝李贽(1527—1602)、王夫之(1619—1692)。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同样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衣食住行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本底色,现实的社会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这正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产生的坚实基础。当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离唯物史观还很远,特别是关于人的能动性方面更是拱手让给了唯心主义,因而很不彻底。尤其是在社会历史领域,更是匍匐在自然和王权的神威脚下,连唯物主义的影子都不见了,因而只能称作“半截子唯物主义”。

事实上,唯物史观是近代产业革命之下特有的意识反映,它植根于巨大的社会财富创造力(包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和现实生产能力)和高度紧张的生产关系,正是这种潜力和能力,激发了新思想的诞生。思想观念的先进性要有相应的物质生产条件作为土壤,才能生根发芽,一旦离开了萌发新思想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壤,便不可能产生唯物史观,也缺少唯物史观作用的基础,只不过是空想。如果社会历史条件(物质生产条件)没有长成、成熟到促使唯物史观产生的地步,还没有到非得唯物史观才能开启新的历史征程的时候,唯物史观也不可能如日东升喷涌而出。

人类思想史越是往后发展,越接近于发现唯物史观,最后只剩捅破这层窗户纸。^[9]如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1561—1626)、霍布斯(1588—1679)、洛克(1632—1704)、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1715—1771)、狄德罗(1713—1784)、霍尔巴赫(1723—1789),以及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1804—1872)等,纵观这些人的观点,尽管仍停留在前唯物史观,但都已经在呼唤新的生产力,讴歌其创造性,俨然成了新时代的助产士和代言人。^[10]这种新世界观的萌芽不是空穴来风,它就产生于资本主义

上升期,甚至连那些资产阶级开明派都佩服有加,折服于这样的真理。正是有了这些接续的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运动,马克思最终站到了人类思想史的巅峰,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揭示出唯物史观。^[11]

这一结果并不表明马克思跟从前的旧哲学没有区别,当然,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不是表现在对新生产力的肯定与接纳上,而在于唯物史观更进一步地将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紧密地联系起来。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从思想到行动都切断了与大地之母的脐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资本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这样两个极端(两种再生产形式同时进行)彼此间联系全部外化为市场价格,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相应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缺口也会越来越大,因而产生经济危机。

可见,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二分,这种二分结构(构造)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都具备的,这种基本结构并无二致,而且这种二分结构是唯心史观最先勾勒出来的,唯物史观只是步其后尘而已。不可否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结构是唯心史观留下的理论遗产,唯物史观继承并加以改造,从而为我所用。其改造之处,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于将原有结构的重心和头足倒立的次序颠倒过来。^[12]

概言之,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进一步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唯心史观只承认基础性作用而不承认其决定性作用,而唯物史观不仅承认其基础性作用,且承认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唯物史观在唯心史观最不彻底的地方,坚持了唯物主义,并将它贯彻到底。当然,如果历史没有发展到那一步,能够使得物质财富的极大创造成为可能,那么,唯物史观也不可能胜出。因而这种彻底性是跟历史条件紧密结合的,是与时俱进、发展创新得到的结果。

三、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

首先接受的是唯物史观

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之后的多次惨败,则将国家推到崩溃边缘,备受欺凌。无数仁人志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为着解万民于倒悬转而探索富国强民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之后尝试过无数种政权形式,有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都未能成功。各种政治势力轮番登场,却与强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渐行渐远。

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从此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追求才有了“主心骨”,一个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得以形成。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近代史上,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曾经在各种主义和思潮中进行尝试。有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却没有走通;也曾经有人试图走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道路,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武装人民群众,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什么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这是最值得探究的问题,不仅有助于对党

史、国史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究其根源,在于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正确行动的指南。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14]

中国近代化是在本土封建主义堡垒与外来帝国主义列强、东方和西方正面碰击声中揭开大幕的。持续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所采纳的主张是“以我为主”“拿来主义”,采取“中体西用”“师夷之长击夷之短”对策,但在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这套主张和对策也随之灰飞烟灭。转而“全盘西化”,一度短暂地占据舆论上风,但也不过昙花一现,仅有“百日维新”而已。由于内有封建势力重重阻碍,外有列强虎视眈眈、伺机瓜分势力范围,使得继之而起的民国举步维艰,长期处于列强干预、军阀割据局面,国家分崩离析。中国近代化便是在这种绝境下艰难起步。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找到、接受并最先拿来使用的就是唯物史观。^[15]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1920年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一度达到150人,李大钊写的很多文章都跟宣传唯物史观直接相关。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刊登在这一期上。^[16]《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先驱》《共产党》以及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上海《星期评论》等一批进步报刊都在大力传播唯物史观。如果说1848年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是“幽灵在欧洲游荡”,^[17]经过70年时间酝酿之后,它掀起了飓风席卷1917年的俄国、1919年的中国,唯物史观在广大土地上迅速传播开来,深入人心。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撰写“创刊宣言”,提出两大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得到的答案是:“吃饭问题最大”“民众联合力量

最强”。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8]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都让唯物史观在史学领域大放异彩,充分崭露头角。郭沫若在该书《自序》中强烈呼吁那些“谈‘国故’的夫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19]

五四时期掀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是只刮一阵风、转瞬即逝,而是以此为契机使得唯物史观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形成气候,自此以后,唯物史观便深入人心,启发并改造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至深至远。如蔡尚思(1905—2008)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中自陈,在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潮中,“最广大精微者,却只有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史观”。连北京大学教授、《食货》主编陶希圣,^[20]以及主张复古的史学家钱穆,在他们身上毫无例外地都能找到唯物史观的思想痕迹,足见唯物史观的感染力有多强。^[21]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一大批史学家自觉加入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行列。

四、唯物史观为近代史上有关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时的知识分子,即便不谈马克思主义,也避不开唯物史观,因为能用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切中时弊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非唯物史观莫属,其他任何主义都无法提供如此锐利的思想武器。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社会史论战,若没有唯物史观指导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甚至提不出这样的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什么样的社会矛盾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性质,有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就解决什么样的社会矛盾,解决这样的社会矛盾就是未来的根本任务”,认定社会性质无疑是头等大事,因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将决定今

后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和走向。

中国近代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得出的正确结论,“其他任何主义都得出科学结论”。^[22]唯物史观主导(指导)下的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担负起了这项重任,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自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科学论断深入人心,成为所有革命理论的立论基础,划清了敌友界线,由此得出的所有结论,必将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唯物史观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成为理论创新的策源地。经由革命的实践,源源不断结晶新的理论成果,同时也锻造了坚强的革命队伍,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品质,唯物史观成功地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可见,唯物史观是活的方法,不是死的教条。教条主义有如拐杖,不能代替走路,否则很容易发生磕绊,甚至被绊倒,只有最终抛开拐杖才能真正学会走路。同样道理,只有克服教条主义,党才能成熟,革命才能成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最先取得成功,就是突破了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一环,中国和俄国一样都处于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那么,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否沿袭俄国城市暴动的方法、建立工兵组成的苏维埃政权形式,这是摆在中国革命面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决定革命的成败。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能不能不由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仅摆在19世纪末俄国人面前,也同样摆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的面前。^[23]马克思晚年已明显觉察到东方社会即将面临这样的选择,即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将会如何诞生,新的社会形态将如何形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当资产阶级降临人间时,无产阶级也同时降临到了这个世界,如果此时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掌握主动权、主导权,为什么非得经由资本主义阶段尔后才进入社会

主义阶段呢?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主张将主导权拱手相让,造成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受到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爆发的中国革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沉重压迫,受害面最广的是农村,受害程度最深的是农民,农民是不可忽视的革命同盟军,是革命队伍中的有生力量。要掌握这样一支革命力量,必须首先从思想上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确立“党的领导根本原则”,无不是这种思想路线结出的硕果。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但凡革命成功的时候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底之时,但凡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都是教条主义横行之时。不同思想路线导致不同结果,工作方法不对路,就会南辕北辙。1978年全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壁垒,解放了思想,是一次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思想总动员。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成功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法宝,是百年大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金钥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源泉。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视现实,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方法论一贯到底。

五、唯物史观着眼于如何将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有关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历史教材不只有正面论证,还有很多反面例子,因而更生动,也更有说服力。在众多反面教材当中,教条主义便是其

中最突出的例子。教条主义有多种面目,既有极“左”的也有极右的,还有中间的,战线拉得很长,尽管表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却有着普遍的、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严重脱离实际。党的思想路线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搞瞎指挥,路子就会越走越窄,甚至一条道走到黑,使得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例如,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犯了右的教条主义,主张“二次革命论”,退避三舍,主动放弃领导权,是一个极端;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内“王明路线”则是“左”倾教条主义,主张城市暴动、武装保卫苏联,把革命低潮误判为革命高潮,又是另一个极端。在中共党史上,“左”倾教条主义这个被我们长期以来斥之为“左”倾机会主义的东西,其危害性极大。^[24]从根本上来讲,教条主义是反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必然被历史洪流所淘汰,不可避免地惨遭“滑铁卢”。^[25]1957年4月,毛泽东召集史学专家座谈、回顾党史时不无感慨地说,“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26]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也明确指出,党史上教条主义危害性极大,“纵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左’好像革命,实际是害死人。”^[27]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吃了太多苦头、付出血的代价,吸取惨痛教训,痛定思痛加以改正,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唯物史观的坚决捍卫者和努力践行者。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一步步取得成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唯物史观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凝结为正确的思想路线。唯物史观立足于社会持续发展的方式及其动力,坚持物质第一、社会财富创造决定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地丰富唯物史观的内涵。事实证明,理论只有彻底了才能为广大群众所信服和接受,而只有被群众接受,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再认识,就是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表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明确

表示,社会主义本质在于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市场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都不是什么本质问题。邓小平的讲话解决了前进道路上的思想包袱问题,意味着配置社会资源的手段不局限于计划,还可以用市场手段,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凝聚起了发展的共识与合力。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大理论命题,已经触及了经济基础,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的仍是基础性地位。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积极理论成果之一,在于指出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作用,不仅强调它的基础作用,还进一步指出它的决定性作用。前者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理论成果(由此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局面),从1992到2014年,又积累了22年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的作用,进一步细分出两种作用,即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充分尊重市场的主体地位。

这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结果。承认并强调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是唯物史观应有的理论姿态,是新时代对于唯物史观新的理论贡献。唯物史观的理论彻底性使得它能够在实践中转化为巨大的社会财富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产生卓有成效的生产力,表现为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以及亿万人民汇聚起来的积极创造社会财富的合力。唯物史观的力量正在于此,所以它一经产生,便能发挥无与伦比、摧枯拉朽的理论威力,成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因此不断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再认识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有关生产力内生性的内容,

更是破除教条主义框框的一把利剑。

所谓生产力内生性,就是指生产力内在于生产方式之中,是在已有的生产关系中酝酿出来的,而不是外在的,新生的生产力正是在已有的生产关系中滋长壮大的,可见,孕育着新生产力胚胎的“母体”是生产关系。有没有事先存在的生产力呢?当然有,但它只是作为基础性、条件性而存在,因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现成的生产力。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力量在起决定作用,那也是尚未成形、潜在的生产力,后者自始至终都在无形地牵引着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其力量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最终显山露水浮现出来。既然预先不可知,也不是事先给定的,又怎么能说它起着决定作用呢?显然,其本身就处在被决定的位置上。因此,这个决定力量始终是缺位的。就是潜在的生产力,也是可塑性,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必然。要说这种不可知的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生产关系,结果是虚无缥缈的,连自身的命运都无法把握。

与生产力内生性命题相关的论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对待农业合作化的主张中。当时党内有两种不同声音,一派认为没有拖拉机就不能搞合作化,缺少了这个必要条件,因而搞不成、也搞不好,对此心存畏惧情绪;另一派则认为,合作化跟有没有拖拉机无关,这并非必要条件,没有拖拉机也照样上,号召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前者给出的是标准教科书般的理由: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手推磨产生的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8]“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29]马克思视机器这种新的生产工具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第二,劳动工具反映的正是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以及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彼此

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产关系不能超阶段地存在,否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缺少了拖拉机就形不成合作化的凝聚力,提前搞合作化便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不能急于求成,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取得最终成功。把生产力当作外力,把生产工具当作可输入的外来因素,这是很典型的外力决定论。

若生产力是内生的呢?结论就大不相同,情形也就有了根本的改观,前述的那些限制条件都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合作化也由被动转向主动。^[30]毛泽东当时举了一个非常生动有力的例子,从而把党内所有人都说服了。这个典型案例,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当初也没有机器,然而,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然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这种情形的确跟使用机器(新的生产工具)无关,因为机器那时还没有被发明创造出来。

新的生产工具是尔后产生的,是被新的生产关系催生出来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新的生产力就是被其内在创造出来的。比如所有的供给,都是在有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有需求才会有供给。现成的生产力(包括机器),都是在已有的生产关系网络中产生的,所有技术创新以及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莫不如此。在实行工场手工业之初,谁也不会料到以后还会有机器大工业,而其结果,生产方式的更新却是如此之快,工场手工业在注销了旧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把自己注册到被淘汰的名单里。从事后来看,以机器取代手工劳动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必然结果。从机械化、自动化到人工智能,所有技术创新都是各自生产关系当中孕育出来的,这些技术装备都不曾事先存在,而是事后发明创造出来的。如此说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到底是谁拽着谁往前赶,不是显然的吗?

再如,在同样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而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其中决定性的关键一

招,就不能说是生产力,而是由新的生产关系带来的——市场是一种广泛存在、普遍联系的生产关系,它不是生产力,但胜似生产力,因为它创造了数倍的生产力。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是改革开放的高度缩影,当初起家时那里没有什么新技术,每家最多仅有一两台旧机床,但通过交换关系联结,结果连成容量庞大的市场网络,其产值甚至抵得上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如此贸易规模、如此宏大场面,无法沿用生产关系的能动性来解释,只能用生产力的内生性来解释,否则就落入教条派的俗套,面对现实显得异常被动。教条派狼狽不堪,能动派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都在原有的认知结构中打转,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倘若把生产力成倍增长都说成是能动作用的结果,未免太夸张了,大到了喧宾夺主地步,又何谈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呢?显然已超出了能动的限度。如此悖论促使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唯物史观,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

当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曾毫不客气地指出旧唯物主义机械僵化的病根,而有关能动的方面全让唯心主义占去了。170年之后,这种局面是否彻底改观了呢?显然没有那么乐观。虽然唯心主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机械僵化的唯物主义仍旧普遍存在。正是生产力内生性,打开了这种僵化封闭的思维范式的缺口。^[31]

为了进一步得出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结论,需要继续往下推导两步。第一步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本身,理顺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重新剖析唯物史观内在的结构;第二步阐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彻底性的结论。

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生产方式是“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面”,也就是说,生产方式从一个方面看是生产力,从另一个方面看是生产关系,既没有脱离了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没有脱离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否则就是干瘪的木乃

伊。考古中的青铜器只有还原为具体历史生活,才有殊胜的价值。正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两面,本身就是一回事,因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句话才有新意,意味着生产力在决定它自身,即生产力不断地为自己开辟出新的道路,从而深刻地揭示出生产力的革命性以及生产关系的能动性,使得两方面内容都能充分地展现出来。这正是马克思所要表达的辩证法的真谛,是辩证法的关键所在。

同时,“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意味着生产力发展是不可逆的,哪怕被全部摧毁,但只要那些人口尚在(更不要说生产关系了),很快就会重建起来。汉初文景之治,安民休养,不出三十年就兴盛无两;二战之后德国、日本迅速重振,这些诸多表现都是典型的例证,反映的恰恰是生产力决定论所无法解释、也不愿面对的内容,因为后者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离开了辩证法当中“一”这个根本宗旨,因而兜不圆。其所谓的“一分为二”,实际上已经作了“三分”,它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辩证法的根本精神。

唯物史观着眼于如何将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僵化的教条中解脱出来,重又焕发出革命性和战斗性,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入强大的精神推动力。

注释:

[1]新华社:《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07/content_5740520.htm。

[2]王伟光:《唯物史观大的“历史时代”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3]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新型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

[4]“康雍乾盛世”将近百年,却对当时正在发生着的、如火如荼的西方工业革命置若罔闻。之后未出五十年,就身不由己地被东西方列强强行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无底深渊。

[5]《刘国光经济改革论集》率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现象和剩余价值生产进行探索,指出私营企业具有商品生产两重性、资本积累两面性特征,因而在鼓励、支持包括私

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加以规范、引导和把握,才能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添砖加瓦。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政治经济学命题,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发展稳定,《论集》分量之重,所虑在此耳。见《刘国光经济改革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451页。

[6]“两个毫不动摇”原则进一步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政治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无论就其企业数量、产值、税收还是就业来说,所占比重都是大头,民营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不容忽视,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重视它则有利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轻视、藐视、敌视它则不利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7]如古希腊神话,命运女神往往喜怒无常,人类仅凭理性无法战胜它。到了中世纪,更是将历史发展归因于天启,对此大多数人更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大自然淫威之下。

[8]包括民间最有影响力的四大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讲的也都是人中龙凤;《西游记》里则有个天庭罩着,各方神灵据守一方,井然有序,孙悟空能够上天入地,本事再大却连如来佛的掌心都跳不出去,最终只能乖乖地跟随唐僧一路去西天取经,修成的正果也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归顺天庭;至于《红楼梦》,曹雪芹写的也是大院子里贵族生活,普罗大众够不着边,只有偷窥猎奇的份,满足虚荣心增加谈资罢了。

[9]任何观念转变都不是一人努力的结果。例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历史上也不是只有一个哥白尼(1473—1543)在推动,而是一大批天文学家如伽利略(1564—1642)、开普勒(1571—1630)等人接力奋斗的结果,只有当事实越来越充分地被揭露出来,证据越来越确凿时,托勒密体系才寿终正寝。说是寿终正寝,其实是被新体系消化吸收了,而非被彻底遗弃。因为地心说在一定范围内仍然管用,而日心说也不过是更大范围内的地心说而已,是一棵树上结出的精神果实,有着共同的基底。

[10]譬如,霍布斯着眼于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民众利益,洛克强调政府只有得到被统治者授权才是合法的,保障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这种观念的更新都说明,时代确实进步了,人民性最终浮现在了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之上。而在近现代资本主义到来之前,西欧已经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洗礼,分别是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科学实验的革命,不断地冲刷千百年来经院哲学荼毒与统治人们思想积存的尘垢,世人终于可以公然地发财致富而不必遮遮掩掩。

[11]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赫斯(Moses Hess,1812—1875)比马克思大6岁,却对马克思的能力赞誉有加,称马克思为“我的偶像”,认为“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其能力远超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与黑格尔诸人,甚至于要“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我所说的是结合而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马克思博士”。参阅《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马克思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24页。

[12]考察马克思1844年巴黎笔记,最后部分重返“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精神现象学》,为此做了大量摘要,形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笔记》中的第三笔记。1858年1月,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有关利润部分时又重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表示,“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的、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21页。)两三个印张,以32开本计有60—90页之多,5万字以上,相当于一本小册子的规模。在1872年《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集中谈到了辩证法:“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然而,马克思终究没能写出现成的辩证法大纲,后人只能从字里行间去捕捉。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点出,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体现在《资本论·第一章·商品》中,是对辩证法注解。但究竟指商品两重性还是价值和价格关系,列宁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因而导致后人诸种争论。争论暴露出的最根本问题,仍在于对辩证法本身缺乏整体把握,理解上有偏差。

[13][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14]栢林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情研究报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6—9页。

[15]王伟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16]连载于《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6号,李大钊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其中,“物质的生产力”是导致经济构造变化的“最高动因”。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18]《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1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20]陶希圣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著有《中国社会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等,成果颇丰,曾被郭沫若引为“同志”,认为“他(指陶)的方法大抵上是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倾向”,鼓励陶“纠集同志”分工合作把中国社会史这项事业继续做下去。1936年郭沫若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直到20世纪末,何兹全仍为陶希圣辩护:“就学术论学术,使陶希圣高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独领风骚的也就是这唯物辩证法。没有辩证法,陶希圣也写不出这么多书,也成不了陶希圣。写出了书,只会是另外一种陶希圣。”(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这些材料都说明唯物史观的影响力有多大。

[21]钱穆尽管最终成了史料派,但他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史,也是不争的事实。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出版于1940年6月的《国史大纲》,这一成果至今仍是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通史类书籍之一。陈寅恪评价其中的《引论》是“一篇大文章”;严耕望认为“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寅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曹聚仁认为“中国史学家之中能够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史事,如此纯熟精到的,钱氏以外,绝少其人。”姑且不论钱氏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如侯外庐、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都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素有“五老”之称),我们看到的基本事实就是,在当代史学家中,谁不把物质力量以及群众创造物质的力量当回事,立论就缺乏说服力,难以取得大的成就。上述一系列实例,旨在说明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3]“广大发展”一语最早见1945年3月3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草案当中。这个报告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认为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其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有益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3、275页。)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之后在1949年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都继续肯定这一论点。然而,认识的转折点同样也出现在了1948年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决定作用,严肃批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资本主义”这种错误观点,强调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亮明政治底牌,“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24]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王明犯的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以往党史教科书都是说“左”倾机会主义。

[25]1929年,毛泽东在分析红四军存在各种错误思想根源时第一次从“思想路线”这个高度去分析和总结经验,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即《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26]张蕾:《黄顺基——道法自然 渐臻佳境》,《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2日。

[27]陈开枝、陈建华、姚欣耀:《回忆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12页。

[30]参阅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6-201、205页;林蕴晖:《党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78页;马社香:《毛泽东“逐渐集体化”与刘少奇“先机械化后集体化”从异趋同的理论疏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5期。

[31]其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统一于生产方式、三者“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两个论点联合起来,就能够破解僵化的生产力决定论体系。

[责任编辑:陶婷婷]